

杭州市哲学
社会科学规划
课题研究成果

明代杭州研究

(上册)

杭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杭州文史研究会 编

杭州出版社

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研究成果

明代杭州研究

(上册)

杭州出版社



杭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杭州文史研究会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代杭州研究 / 杭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杭州文史研究会编.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80758-091-1

I. 明… II. ①杭… ②杭… III. 杭州市—地方史—研究—明代 IV. K29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TP数据核字 (2008) 第085017号

明代杭州研究

杭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杭州文史研究会 编

责任编辑 陈晓蓓 屠文镛

装帧设计 杭州乾嘉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 (杭州市曙光路133号)

电话: (0571) 87998167 邮编: 310007

印刷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8.125

字数 421千

版次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758-091-1

定价 68.00元 (上下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明代杭州研究》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孙忠焕

副 主 任 张鸿建 郁嘉玲 赵光育 熊恩生 孙 跃
宋 涛 马国超

编 委 王利民 胡耀清 董郁奎 楼毅生 项文惠
倪素浓 夏卫东 张学勤 杨为然 陈江明

学术顾问 南炳文 陈学文 林正秋 顾志兴

主 编 宋 涛

副 主 编 董郁奎 王利民 倪素浓

序

明代（1368—1644）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它把中央专制集权的官僚政治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达到了新的高峰。朱元璋废中书省和丞相制，使皇权得以空前扩张。在经济上，农耕技术进一步提高，玉米、番薯等粮食新品种在嘉靖、万历年间从国外引进，并很快得到了推广，桑树、棉花等经济作物被广泛种植。到明代中后期，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不断改进，经营方式逐步改善，资本主义因素开始萌芽。进入明中期以后，出现白银货币化和农业生产商品化的趋势，农民纷纷入城从事商品交易，国内外贸易十分活跃，商品经济日渐繁荣。全国各地涌现出了许多商业发达的城市：南北两京、苏州、开封、杭州等老城市都获得了新发展；专业性市镇大量兴起，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数量尤多。近代中国市镇的规模和布局，在明代已基本奠定。明代的科技文化成就也令人瞩目。十二平均律的创建，《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徐霞客游记》、《天工开物》等巨著的出现，表明明代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仍居世界前列。明代中国的综合国力在亚洲乃至世界都处于优势地位，即使是在明后期国势衰敝之时，其经济发展水平也较欧洲略胜一筹。在明这个新旧杂陈的朝代，已

经开始了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遗憾的是明清易代打断了这一历史进程。

从世界史的角度来观察，明代正值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已透露出资本主义曙光，东西方文化开始碰撞，新旧交替的社会大变动逐渐酝酿。但因明代与秦、汉、唐、宋等时期相比，无论是典章制度，或是文治武功，并无显著的业绩，因而传统史学一直关注较少。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明史研究进入了新阶段，研究领域不断开拓，出现了不少很有价值的论著。

长期以来，学术界特别是浙江省、杭州市的专家、学者对明代杭州的研究较为重视，为此付出了很大努力，取得了许多令人鼓舞的成绩。但从总体而言，研究涉及的领域虽然较广，也还是存在许多研究欠缺的领域，即使研究着力较多的领域，也缺乏足够的深度，还有待于着力研究，深入探讨，持续发掘。明代虽然仅是杭州历史长河的一段，但在杭州的发展进程中却起到了重要的传承作用，为杭州今日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我们完全有责任高度重视和研究好这段历史。

一、明代杭州，人口繁茂，处浙江社会经济发展之前列

杭州历史悠久，钱塘自古繁华。至明代，杭州繁华依旧，仍为各地之翘楚，被誉为“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据明万历《杭州府志》徐枋的序中记载：“今天下浙为诸省首，而杭又浙首郡，东南一大都会也。其地湖山秀丽，而冈阜川原之所襟带，鱼盐粳稻、丝绵百货于是乎

出，民生自给，谭财赋奥区者，指首屈焉。”这是对明代杭州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一个极好概括，评价很高。据成化年间的统计，当时仅杭州城就有9万户，30万人。此后，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口逐渐增加。李鼎《李长卿集》记载：“武林生聚敏茂，盖以列郡之期会者，殊方之懋迁至者，奚翅二三百万，即以百万计之，日食米万石。”这表明，若计入大量的流动人口，杭州城人口至少达百万以上。明代杭州是当时中国丝织生产的重心之一，丝织业十分发达，西溪一带桑园遍野，横泾（今余杭区瓶窑附近）也是“绿桑遍地”。明中叶以后，杭州府的塘栖发展成为以经营丝绸商品为主的市镇；当时的一种先进丝织机——花机已在杭州广泛使用；供应的织物品种很多，仅仁和县一县所产的帛就有绢、纱、綾、罗等十多种。杭州丝织品在国内外声誉颇佳。永乐年间，明成祖就在杭州设立织造局，有房屋120间；成化年间，杭州每年需上交朝廷的纁、纱、罗、绸等共3600多匹；海外市场对杭州丝织品的需求甚强，在当时中国通过对外贸易赚取大量外国白银的过程中，杭州丝绸就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明代杭州的西湖香市，亦颇著名。唐宋起始的“香会”至明代，已经演变成了颇具特色和规模的定期香市——西湖香市。每年春季，香客云集，各地客商纷至沓来，香市所设，从三天竺、岳王坟，一直到湖心亭、陆宣公祠，最后集中于昭庆寺，一时形成了“有屋则摊，无屋则敞，敞外有篷，篷外有摊”，各商铺店肆，鳞次栉比，商品琳琅满目，云集成市。明末清初文人张岱在《西湖梦寻》中用了“数百十万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阅月方罢，恐大江以东，断无此二地矣”，描述了西湖香市之盛。至今西湖香市依然兴旺。

二、明代杭州，开放包容，得外域文化风气之先机

明代中后期，“西学东渐”，大批耶稣会士、商人和使者来到中国，传播天主教教义和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先进科技文化，这是中国自晋唐以来知识线第二次与外国相接触的时代，是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放眼看世界”的时代，而彼时的杭州则是天主教史所称的明末天主教传教中心。被誉为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三人之中，李之藻和杨廷筠均为杭州人。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意大利耶稣会士郭居静、金尼阁和钟鸣仁应李之藻之邀，在其家中举行了第一台弥撒，这一天被后人称为杭州天主教开教日。天启七年（1627），杨廷筠出资在杭州观巷建造教堂一所（在今中山北路天主教堂西），是杭州第一座天主教堂。继马可·波罗和利玛窦之后，对中国和意大利科学文化交流作出杰出贡献的一位历史人物，被称为“西方研究中国地理之父”的意大利耶稣会士、欧洲早期著名汉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神学家卫匡国，于崇祯十六年（1643）来华后，就曾在杭州传教，建造教堂，病逝后葬于杭州大方井。李之藻、杨廷筠等人也为中国古代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比如李之藻，与徐光启齐名，万历四十一年与利玛窦合译的《同文算指》是中国编译西方数学的最早著作，所译的《名理探》一书是名学中的最早译本，所编的《浑盖通宪

市——燕市（北京）、金陵（南京）、阊阖（苏州）、临安（杭州），杭州即占其一。

四、明代杭州，承前启后，奠杭州其后发展之基础

自明洪武十四年（1381）始，现在的浙江省从当时的江浙行省中划出，单独成立浙江行省，此后的600余年，杭州便一直是浙江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杭州的“金名片”西湖，就是在明代得以重新疏浚而再获生机，西湖中的杨公堤、湖心亭、“小瀛洲”、万松书院等至今家喻户晓的西湖景点，即在明代修筑或重建。闻名中外的西湖龙井茶，在明万历年间开始进入全国名茶行列，据明人黄一正编撰的《事物绀珠》所列，龙井茶在当时全国96种名茶中列第21位，至清乾隆年间，正式位居全国名茶前列。

今日杭州，依然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活力充沛的城市。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共杭州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下，杭州的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连续十余年保持GDP两位数增长，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省会城市第2位、副省级城市第3位、大中城市第8位。社会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城市综合实力在国内同类城市中名列前茅。杭州相继获得了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旅游城市、联合国人居奖、中国城市总体投资环境最佳城市、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中国十大最具经济活力城市、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等诸多桂冠。今日杭州，又踏上了新的征程，正在共建共享与世界名城相媲美的生活品质之城。

文史工作作为人民政协具有特色和优势的一项工作，在“存史、资政、团结、育人”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图说》是中国第一部介绍西方近代天文学的著作，所刊印的由利玛窦绘制的《坤輿万国全图》，是中国诞生的第一张近代意义上的世界地图。他还协助徐光启修订《大统历》，编撰《崇祯历法》，并和徐光启一起，与在澳门的西方传教士龙华民、毕方济等购买、研究和制造西洋大炮——红衣大炮，一度有效地阻止了后金的进犯，影响着明清易代的进程。

三、明代杭州，文艺兴盛，领市民文化风气之潮流

明中后期，传统正宗诗文等雅文学走向衰落，小说、戏曲等俗文学勃兴。杭州出现了在宋代话本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通俗小说，包括长篇章回小说、白话短篇小说，以其浓郁的地方色彩和繁荣的创作局面在中国小说史上独放异彩。始于宋代后演变成今日杭州南词、苏州南词（即苏州评弹）、宁波四明南词和绍兴越郡南词（即绍兴平湖调）的一种说唱艺术“陶真”，在明代杭州依然盛行。这一时期的中国四大传说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均以杭州为背景，并以戏曲和曲艺形式广为流传。明代杭州也涌现了一批本地文学家，较著名的有瞿佑，著有《香台集》、《剪灯新话》等20余部作品。其著作《剪灯新话》中的许多故事情节，被改写成话本编入“二刻”的《拍案惊奇》等多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可谓是上承唐宋传奇之余绪，下开《聊斋志异》之先河，在中国文言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明代杭州的图书刻印发达，丛书和小说的刊刻独树一帜，官府藏书、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和寺庙藏书均十分丰富，而且书市兴旺，明代的四大书

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各级政协的文史研究一般都围绕当地的历史和文化而展开，是地方史研究的重要推动力量。新时期新形势迫切要求政协文史工作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上开拓创新：研究时段需要从当代史、近现代史进一步向前延伸，研究手段应该从“存史”向“证史”发展，研究领域需要从历史事件研究拓展到社会史研究，把以往对历史上的人物、事件的个案研究，拓宽到某一历史时段的社会、经济、文化等的发展趋势和细部的研究。这部由杭州市政协组织编写的《明代杭州研究》，就是对政协文史工作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上进行开拓创新的一种积极尝试。我们希望通过政协文史工作搭建的这一历史研究的新平台，为各位专家、学者和文史工作者对明代乃至其他历史时期的杭州开展深入研究提供支持，为今后杭州发展提供历史殷鉴。

孙忠焕

序二

杭州是浙江省的省会，是国内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因而加强对杭州现状与历史的研究，为继续建设、发展杭州提供帮助，意义十分重大，这不仅是杭州的大事，浙江的大事，也是全国的大事。而明代杭州，是杭州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杭州的名片西湖是在明代得以重新修复的，杭州的农业及丝织业等手工业在明代均得到令人瞩目的新发展，杭州在明代出现了许多闻名全国以至具有世界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化名人等，明代杭州的发展，为其后杭州的发展奠定了新的坚实基础，没有明代杭州的发展，就没有今天的杭州。从全国角度讲，明代杭州史是明代中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杭州的成就是明代中国的骄傲。因此，在研究杭州历史过程中，必须下大力气研究明代杭州史，在研究明代中国史过程中，必须把明代杭州的研究纳入视野。这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是发展学术研究的要求，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杭州以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需要。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明代杭州的研究相当重视，特别是浙江全省以及杭州市的专家、学人和有关机构，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花费了许多心血，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

根据本人往日研究明代历史时留下的粗浅印象，我所了解的这些成绩包括：

一、在有关浙江历史、中国通史以及明朝断代史的著作中，对明代杭州的历史，作了或多或少的论述。如倪士毅著的《浙江古代史》，范文澜、蔡美彪等著的《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傅衣凌主编的《明史新编》等，即是如此。

二、在关于全国或某一特定地区的某一领域的专题史论著中，对明代杭州的同一领域，作出或多或少的论述。如赵德馨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余也非著的《中国古代经济史》和陈学文的《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周德昌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研究·明清分卷》和李国钧主编的《中国书院史》，徐宗泽著的《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钱茂伟著的《明代史学的历程》等，分别在研究全国的经济史、教育史、宗教史、史学史时，对明代杭州的同一领域作了研究。再如蒋兆成著的《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研究》、范金民著的《明清杭嘉湖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陈学文著的《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樊树志著的《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刘石吉著的《明清时代江南市镇史研究》、林正秋著的《浙江经济文化史研究》、方豪撰的《浙江天主教史略》、陈野著的《浙江绘画史》、顾志兴著的《浙江出版史（元明清时期）》等分别在研究杭嘉湖、江南或浙江省的经济史、宗教史、绘画史、出版史时，对明代杭州的同一领域作了研究。

三、在比较全面地介绍杭州历史的著作中，对明代杭

州的历史，作出了多角度的关注。如郑云山等著的《杭州与西湖史话》、钟毓龙著的《说杭州》、周峰主编的《元明清名城杭州》、陈洁行著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杭州》、倪士毅著的《古代杭州》等即是如此。

四、在关于杭州的跨时代专题史研究中，对明代杭州的同一领域，作了比较详细的研究。如陈学文撰的《明清徽商在杭州的活动》、吴振华撰的《明清时期杭州西湖书市》、冷晓著的《杭州佛教史》，在研究明清两代杭州的商业及历代宗教史中，对明代杭州的同一领域作了比较详细的研究。

五、对明代杭州进行专题研究。如辰伯撰的《明初杭州之丝织工业》、陈学文撰的《明代杭州城市经济发展及其特色》、论文集《于谦研究》、陈垣撰的《李之藻传》、罗青撰的《明末大画家陈洪绶》、徐进华撰的《蓝瑛的画艺生涯》、朱倬撰的《明季杭州登楼社考》等分别对明代杭州的经济、政治、宗教、画坛精英，以及文人结社进行了专门研究。

六、在有关明代杭州史料出版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在这方面，除《明实录类纂》浙江、上海卷等相关资料外，杭州出版社出版的《西湖文献集成第三辑明代史志西湖文献》尤其引人注目，其中包括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和《西湖游览志余》、杨孟瑛的《浚复西湖录》、张岱的《西湖梦寻》等十九种，为研究、了解明代杭州西湖的情况提供了方便。

以上所述，挂一漏万，但即便如此，亦可看出，经过

大家的努力，关于明代杭州的研究，确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值得庆贺。在以上所述成绩中，在经济方面尤其硕果累累，这应当与明代杭州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有事可谈有关，也与建国以后，以唯物史观为研究的指导有关。唯物史观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认为经济为社会的基础，以之为指导研究各种问题往往会与这个基础联系在一起加以考虑，这很易于使人们的审视眼光经常投向经济领域。

在看到明代杭州研究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这一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其一，资料准备尚不充分。没有进行、也没有想及应把有关明代杭州的资料尽可能齐全地收集在一起，以供日后研究之用，而基本上只是在遇到某个研究题目后临时从头做起，开始收集相关资料，这种临渴掘井式的资料收集办法，造成了重复劳动，影响了效率，而且造成资料收集丢三落四，影响了齐备性。其二，研究涉及的领域虽已很多，但研究欠缺的领域仍旧不少，即使用力较多的领域也有待进一步深入，诸如政权及基层控制实态、土地制度、财政金融、城市建设、盐业经济、漕运制度、人口流动、民族与宗教、生存状态、防灾救灾等都有待加大力量，深入探讨。其三，尚未写出一部明代杭州专史。虽然在比较全面地介绍杭州历史的著作中，对明代杭州的历史已作出了多角度的关注。但这仍旧不够，还应有一部独立存在的明代杭州专史。这样一部独立存在的明代杭州专史之所以必要，在于它可以完全根据明代杭州的具体状况和特点来设置章节，选择角度，决定详略，不必像在介绍历代杭州历史的著作中那样，为了照顾全书的体例

等而不得不削足适履，忍痛割爱或故意拉长，从而妨碍对明代杭州历史完整而恰当的描绘。

鉴于以上情况，我感到关于明代杭州史目前有如下几个具体工作可以尽快陆续着手进行。

第一，编辑《明代杭州丛书》。

这应是一部规模庞大的大丛书，编辑的目的之一以显示杭州深厚的文化底蕴，之二为研究明代杭州的方方面面准备相当充足的资料条件。这部大丛书可包括四部分文献：一为明代杭州人所写的一切著作，二为明代外地人流寓、任职杭州期间所写的一切著作，三为所有产生于明代及其后的关于明代杭州的专门著作，四为所有关于明代杭州的单篇或片断文献记载。在收集以上四类著作文献时，要注意广泛收集各种体裁，无论官私史书、文集、笔记、日记、游记、族谱、家谱、文书、档案、碑刻、方志、唱词、小说，皆在收集的范围。有人认为小说不可入史，其实此说不尽正确。小说所描写的人物不一定真有其人，但其所描写的社会现象无疑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可以认作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如《醒世恒言》卷16《陆五汉硬留合色鞋》有一段话描写弘治年间杭州富家少年张荩说：“自己打扮起来，头戴一顶时样绉纱巾，身穿着银红吴绫道袍，里边绣花白绫袄儿，脚下白绫袜、大红鞋，手中执一柄书画扇子。后面跟一个垂髻标致小厮，叫做清琴，是他的宠童，左臂上挂着一件披风，右手拿着一张弦子，一管紫箫，都是蜀锦制成囊儿盛裹。”像这种栩栩如生的描写，岂不是让人生动地了解了明代富家少年生活状况的一个侧

面，如不重视丢而弃之，岂不十分可惜！在收集各种资料时，对于出自外国人之手的文献要特别注意。搞中国史，当然主要靠中国人写的资料，此类资料甚多，使用方便，但外国人写出的文献有其独特的视角，往往能记下中国人所忽略的部分，因而不可忽视。如日人策彦周良于嘉靖年间来中国，其所写游记《策彦和尚初渡集》记嘉靖十八年十一月初一到杭州城里时所见称：“已刻，上岸，自西北门入杭府。府中所过，及第门多多，有‘双凤坊’、‘海蛟竞起’、‘奎壁联辉’、‘世进士坊’、‘父子翰林’、‘振纲肃纪’等之类，不遑枚举。又帘铭有‘河清老酒’、‘金华老酒’、‘短水白酒’、‘罗浮春’、‘洞庭春色’、‘上色清香高酒’、‘瑶池玉液’、‘紫府琼浆’等之类，不可悉记焉。又有学校，门揭‘小学’两大字，里有一门，横额‘云程发轫’。又有寺，寺门架以层层华构，犹如层塔，门中央以金揭‘真教寺’三大字。又有铺，或刻牌以‘郑氏凉伞铺’，或以‘清油细伞铺’。帽铺、红铺、银铺之类不知数。又有卖饼店，以木造饼形，书中以‘大白雪饼’。又有卖饭家，有木牌，书以‘家常大饭’。又有一门，揭‘国医坊’三大字，盖医家坎？有二重楼，横揭‘镇海楼’三大字，盖置漏量时之楼也。过其下，出此楼左畔，有路之通翠微，有一小门，揭‘登高览胜’四字，盖于此一览西湖也……”这无疑生动地记述了其时杭州城内文化发达、商业繁盛之情形，极为难得。在收集关于明代杭州的资料时，此类记载决不可遗漏。笔者设想的《明代杭州丛书》，规模庞大，实行起